

## 中國歷史地圖：從傳統到資訊系統

葛劍雄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所謂歷史地圖，是指以過去某一年代或時期的地理狀況為表示內容的地圖。所以，以表示當代當時的地理狀況為內容的地圖，即使流傳了很長的年代也只能稱之為「古地圖」或「古代的地圖」，而不是歷史地圖。但被稱之為歷史的過去一般都有特定的含義，如前一個朝代、某一個歷史階段等，而不是此前若干年或一段短時間之前。所以歷史地圖與當代地圖或今地圖的界線還是很清楚的，古代的歷史地圖大多是以前一朝、歷史上某一階段或此前歷代作為時間斷限。

歷史地圖問世的前提是古今地理環境的變化，正是這類變化才使人們不得不需要看到直接反映古代地理要素的地圖，否則就完全沒有必要。由於山川等自然地理要素的變化比較緩慢，除了像黃河下游及沿海平原地區的河流變化頻繁而迅速外，往往數十年、百餘年、甚至數百年而毫無變化。相反，人文、社會地理要素如行政區劃、地名、建築物、民用和軍事設施等不僅內容繁多，並且變遷複雜，往往在同一朝代之內，後期的人已不了解前期的情況。對那些變化特別頻繁而複雜的階段，往往在當時就沒有留下足夠詳細的記載，如王莽對政區和地名一次次的更改到東漢初已不為人所知。所以，古代的歷史地圖一般是以表示人文社會地理要素為主，地圖的需求則取決於有關地理要素變化的頻繁或複雜程度。由於中國一直有重視歷史的傳統，而地理則被視為歷史學的分支，當作歷史的一部分，所以對歷史的重視直接導致了解歷史地理的需要，並促成歷史地圖的製作。但另一方面，過於注重歷史也使中國古代流傳的地圖往往對一些地理要素不區分古今，或者盲目使用古地名，任意加上古內容，或者不顧地理狀況的實際變化，一味照抄古地圖。

歷史地圖繪製的可能性則取決於相關的歷史資料或信息量的多少。前人在繪製歷史地圖時，幾乎很難直接利用當時的地圖，主要只能根據傳世的書籍和其他資料。歷史上人文社會地理要素變化頻繁而複雜的階段往往正是留下資料極少、信息量極低的階段，因而無法編製出稍為詳細可靠的地圖。可以肯定，早期的歷史地圖是相當粗略的，時間的跨度較大，並沒有嚴格的斷限。或者只是在今地圖上加上若干古內容。

一

西元 3 世紀後期，裴秀「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強牽引，漸以闕味。於是甄補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sup>1</sup>。這無疑是中國歷史上見於記載的最早的歷史地圖集<sup>2</sup>。裴氏在序言中還介紹：

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閭，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為地圖十八篇。<sup>3</sup>

儘管這兩段話相當簡單，但我們還是可以據以推測這部歷史地圖集的主要內容、時間和空間範圍以及繪製方法。

內容之一是自然要素，即「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包括山脈、高原或臺地、河流、湖泊、沼澤、平原、海洋等。

之二是行政區域及其疆界，即「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閭」，所表示的行政區包括州、郡（國）、縣三級及縣以下的邑、鄉。從裴秀採用的比例尺推斷，該圖不大可能畫到縣一級的界線，但至少會包括州一級，可能會畫出部分郡級界線。

之三是可考的重要歷史地名，即「古國盟會舊名」。實際包括兩方面，一是先秦的古國名稱和位置，估計是表示在國都所在地；二是歷史上發生過重大政治活動「盟會」的地點。後一類地名往往只是縣以下的小地名，而且到西晉時早成廢墟，必須作一番考證才能弄清它們的「今地」。

之四是交通路線，即「水陸徑路」。水路與河流的走向是完全一致的，但可能包括一些本身不夠大、不夠重要的河流。陸路則需要根據它們的起迄和經過地點確定後繪出。

《禹貢》是裴秀作為製圖依據的主要資料，這套地圖集的時間範圍顯然是從《禹貢》所表示的傳說中的夏代開始，而結束於「今之十六州」的西晉泰始五年（269）前<sup>4</sup>。該圖的空間範圍大致即魏、蜀、吳三國設置正式行政區域的範圍，包括已經在今天境外的

<sup>1</sup> 《晉書》卷 35〈裴秀傳〉。

<sup>2</sup>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前言》，地圖出版社，1982 年；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地學史組主編，《中國古代地理學史》，科學出版社，1984 年；及劉宗弼、葛劍雄所撰，〈歷史地圖〉條，《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0 年；均持此說。

<sup>3</sup> 《晉書》卷 35〈裴秀傳〉。

<sup>4</sup> 按西晉初因三國舊制，原魏國境內有十二州，蜀國境內一州，吳國境內三州。當時雖未統一吳國，但通計天下，肯定會將吳國的三州包括在內，以與古之九州對應。至泰始五年雍、涼、梁三州置秦州，總數已增加到十七州。至裴秀去世的泰始七年，又分幽州置平州，則更增至十八州。故此圖集的斷限應止於泰始四年。有關西晉初的政區建置，參見譚其驤，《簡明中國歷史地圖集》中〈三國時期圖說〉和〈西晉時期圖說〉，中國地圖出版社，1991 年。

朝鮮半島北部、越南北、中的大部、緬甸北部；但不包括今東北大部、內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地。這一範圍大致可表示《禹貢》九州及此後歷史文獻中記載的大多數地理要素。但由於中國傳統的天下觀念，該圖不可能明確劃出一個地域範圍，至多只是將十六州以外的地方保持空白，並且不排除在那些地方注上「戎狄蠻夷」一類字樣。

由於能夠參考的古地圖很少，特別是根本沒有漢朝之前的地圖，所以裴秀的主要依據還是從《禹貢》開始的歷史文獻，所以他主要是採用文獻考證的方法，確定各種地理要素的名稱和位置後，再表示在地圖上。當代的地理狀況則可根據比較精確的今地圖，包括尚未統一的吳國在內<sup>5</sup>。由於文獻資料同樣相當有限，所以他採取了嚴格的態度，「疑者則缺」，寧缺毋濫。對「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這類地名只知道文獻中記載的古名，卻找不到今地，或今地已不復存在，只能將有關的資料摘錄在適當的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裴秀在繪製這套地圖集時，創立了著名的「製圖六體」<sup>6</sup>，為中國乃至世界製圖史作出了重大貢獻，也保證了這套地圖集具有前所未有的精確性和科學性。通過運用這六項製圖原則，肯定能彌補不少文獻資料的缺陷，解決一些文獻記載無法說明的問題。

從裴秀的序文看，這套地圖集肯定是有文字說明的，不能肯定的是這些文字是直接注在地圖上的（包括地圖周圍的空白處），還是作為附錄集中在地圖的後面。另一個前人沒有注意到或提及的問題，是該圖集為什麼分為十八篇。我想，無非有兩種可能：一是按時間分，不同的時代各作一篇。一是主要按地域分，每州一篇，再加上兩篇特殊情況，如京師、九州等。由於自夏至西晉不大可能劃分出十八個階段，而且此前的地理資料有限，很難將它們準確地分配到這些階段中去，所以後一種可能性顯然更大。只是由於該圖集製成後就「藏于秘府」，見過的人大概極其有限，所以未見他人提及。經過西晉末的戰亂就再未見於記載，從此消失了。

與裴秀大致同時代的杜預，是《春秋左傳》專家，自稱有「《左傳》癖」，著有《盟會圖》<sup>7</sup>。從《晉書》寥寥的記載可以推斷，這是一種專題歷史地圖集，專門表示春秋時期舉行盟會的地點。由於這些地點在西晉初大多已不存在，《盟會圖》很可能是採用了古今對照的辦法。此圖同樣未見流傳。

<sup>5</sup> 裴秀《禹貢地域圖序》：「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見《晉書》卷35《裴秀傳》。證明西晉初的裴秀不僅能看到蜀、吳兩國的地圖，蜀國的地圖已經實際證明相當精確。

<sup>6</sup> 《晉書》卷35《裴秀傳》。有關「製圖六體」含義及其科學價值的論述，前人論著甚多甚詳，此不贅。

<sup>7</sup> 《晉書》卷34《杜預傳》。

## 二

歷史地圖下一次重大進步直到西元 8 世紀末至 9 世紀初才取得。唐貞元十七年（801），地圖學家賈耽繪成了一幅三丈三尺長、三丈寬的巨幅《海內華夷圖》。在獻圖表文中賈耽自述：

臣弱冠之歲，好聞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觀研考，垂三十年。……謹令工人畫《海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別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縮四極於纖縵，分百郡於作繪。宇宙雖廣，舒之不盈庭；舟車所通，覽之咸在目。並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國以《禹貢》為首，外夷以《班史》發源，郡縣紀其增減，蕃落敘其衰盛。……凡諸疏舛，悉從厘正。……舊史撰錄，十得二三，今書搜補，所獲太半。……其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今古殊文，執習簡易。<sup>8</sup>

賈耽的重要創舉是確立了「古墨今朱」的表示方法，既堅持了古今對照的原則，又解決了歷史地理要素與今要素混淆不清的矛盾。其次，賈耽將與地圖有關的考證和說明文字另撰為專書，作為該圖的附件，既使地圖所表示的歷史地理內容有根有據，又避免了圖上注記過多、干擾主題的弊病。不過由於該圖的時間範圍是自古至今，自傳說中的夏朝至唐朝，「古」的階段長達三千多年，都只能用紅色表示，要區別不同時期還是不可能的。賈耽此圖篇幅巨大，地域範圍並不限於唐朝本土，而是「海內華夷」，即包括作者所了解的唐朝以外的全部地理範圍，大致包括今全部亞洲。

這幅圖原本的命運與《禹貢地域圖》一樣，秘藏深宮後就再也沒有露面，顯然早已毀於戰亂。幸運的是，當時還有複製品流傳於世，所以 1136 年（劉豫齊阜昌七年）刻石的《華夷圖》上還刻著「唐賈魏公所載凡數百餘國，今取其著聞者載之」，說明它是根據賈耽原圖轉輾縮繪簡化的。這幅長寬各 0.77 米的石刻歷史地圖上標注的國名、地名約有 500 個，標出名稱的河流約 13 條、湖泊 4 個、山體 10 座。<sup>9</sup> 據此我們也可進一步肯定，賈耽原圖的內容和地名要豐富得多。

賈耽製圖時古內容混淆的缺點，到北宋時已經得到克服，這是稅安禮所編繪的《歷代地理指掌圖》的一項重大成就。據該圖集署名蘇軾的〈序〉，作者「嘗考歷考分志，考驗古昔，始自帝嚳，迄於聖朝，代別為圖，著其因革，刊其同異，凡四十有四」<sup>10</sup>。除了一些綜合性的總圖如《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歷代華夷山水名圖》等，一般都採

<sup>8</sup> 《舊唐書》卷 138〈賈耽傳〉。

<sup>9</sup> 見《中國古代地理學史》，第 303—304 頁。

<sup>10</sup> 據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日本東洋文庫藏南宋刻本，1989 年。

用一階段一幅或一個專題一幅的處理辦法，如有《西漢郡國圖》、《漢異姓八王圖》、《漢吳楚七國圖》、《太宗皇帝統一之圖》等。在這些圖上，古今對照就是歷史上某一階段與北宋後期兩種地理狀況的對照，自然更加明白。據目前所知，《歷代地理指掌圖》是最早採用這種對照方法的，直到清末民初楊守敬的《歷代輿地圖》和當代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都沿用了這種方法。可能是為出於顧及某些讀者習慣於賈耽那種將所有歷史地名放在一起表示法，也可能是一部分地名無法確定它們存在的年限，編者還專門設計了一張〈歷代雜標地名圖〉。

由於印刷條件的限制，刻本不可能做到「古墨今朱」，所以付印時採取一些特殊措施。曹婉如注意到：「例如宋刻本第一幅〈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的古地名之上繪有小圈，以凸出古今地名之不同；…第四十四幅〈聖朝升改廢置州郡圖〉在新升改的府、州、軍名之上繪有小點，以與舊稱相區別。宋刻本圖上的圈和點，在原繪本地圖上可能是朱色，因朱色更為醒目，而且中國自唐賈耽以來即有用朱墨分注古今地名的傳統。」<sup>11</sup>

《歷代地理指掌圖》在北宋時已有刻本流布，至南宋又有新的刻本，並且不止一、二種。前面提到的《華夷圖》右下方刻有「岐學上石」四字，說明上石的主要目的還是供學校的師生臨摹和教學之用。這兩點都證明了早在 12 世紀歷史地圖已受到普遍重視，並已相當普及。

《歷代地理指掌圖》中編繪了一些專題歷史地圖，這種傳統完全可以追溯到杜預的《盟會圖》。至遲在南宋初，這類專題歷史地圖已得到流傳。目前所見最早的有印刷於紹興二十五年（1155 年）前後的楊甲《六經圖》中的〈十五國風地理之圖〉<sup>12</sup>，李約瑟稱之為世界最古老的一幅印刷的中國西部圖。由於《歷代地理指掌圖》現存刻本刊於紹興前期，較此圖略早；而其北宋刻本更早於此圖。此圖以《詩經》中十五國風所涉及的歷史地名為表示內容，並在圖上直接注明今地，如「今太原府晉陽縣」、「今西夏」等。由於《詩經》等儒家經典是士人必讀，又為科舉應試必需，更為學者研究的永恆課題，此類地圖亦長盛不衰。

此後的歷史地圖雖沒有出現什麼實質性的進步，但還是在 20 世紀初由一位沿革地理奇才楊守敬將傳統的歷史地圖研究推上了高峰。就客觀條件而言，楊氏擁有兩方面前所未有的優勢：

一是乾嘉以來的沿革地理研究成果。中國傳統的考據學問被乾嘉學者推到了極致，

<sup>11</sup> 《宋本歷代地理指掌圖》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sup>12</sup> 據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地學》第一分冊，科學出版社 1976 年內部發行，第 136—137 頁；《中國古代地理學史》307—308 頁。原件藏北京圖書館。

而沿革地理始終是考據之學的一個重要方面。可以這樣說，凡是歷史上留下的沿革地理方面的難題，幾乎都已有學者涉足；凡有能夠被發掘的史料，幾乎都已被利用。楊守敬既充分運用了這些成果，又在沿革地理方面有所發展，成為中國沿革地理最後一位也是集大成者，因而楊守敬能糾正不少前人的錯誤，又能解決不少前人長期沒有解決的難題。有了這樣的基礎，他編的歷史地圖才能做到內容豐富，位置（點、線、範圍）正確。

一是胡林翼根據康熙、乾隆時實測繪製的《皇輿全圖》為基礎繪製刊行的《大清一統輿圖》。自裴秀、賈耽至稅安禮，以往的歷史地圖研製者無不受到當代地圖的制約，由於當代地圖不精確，即使對歷史地名的定位相當準確，也無法如實反映在製成的地圖上。「古今對照」的效果如何，古和今兩種要素缺一不可。由於《大清一統輿圖》是自古至清末最精確的全國性地圖，比例尺也比較大，使楊氏沿革地理研究的成果、即他準備上圖的古地理要素能夠得到準確恰當的表示。

楊守敬（1839—1915），20歲時就對沿革地理發生興趣，後與鄧承修共同編撰《歷代沿革險要圖》，此後又與饒敦佚一起修訂，於光緒五年（1879）刊行。光緒末年，楊守敬在門人熊會貞的協助下，對《歷代沿革險要圖》再次作了修改和補充，編繪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國歷史地圖集，自光緒三十年（1904）起陸續刊行：

光緒三十年（1904）：前漢地圖

光緒三十二年：春秋地圖、〈歷代沿革險要圖自序〉

光緒三十三年：三國地圖

宣統元年（1909）：戰國、秦、續漢、西晉、東晉、劉宋、蕭齊、隋地圖

宣統二年：明地圖、北魏、西魏地圖

宣統三年：十六國、梁、陳、北齊、北周、唐、五代、宋、遼、金、元地圖

最終完成的《歷代輿地圖》共線裝 34 冊，起自春秋，迄於明代，全部採用朱墨套印，古今對照，見於《左傳》、《戰國策》、《史記》和各史《地理志》（《郡國志》等同類志）的可考地名基本都已收錄上圖。

差不多與此同時，楊守敬與熊會貞還編繪了一部高質量的專題歷史地圖集——《水經注圖》。該圖集也是以《大清一統輿圖》為底圖，採用古今對照、朱墨套印的形式繪製，不僅是《水經注》研究的重要工具書，也是傳統專題歷史地圖的高峰。

直到 20 世紀 80 年代《中國歷史地圖集》問世之前，楊守敬的《歷代輿地圖》一直是中國歷史地圖中最權威、最詳盡的一種。民國年間出版的幾種用新法繪製、新式裝幀的歷史地圖因內容簡略、質量不高而無法望其項背。就是 1956 年出版的由顧頡剛和章

異編、譚其驤校的《中國歷史地圖集》，雖然始於原始社會，迄於鴉片戰爭，但因只有 31 幅地圖和 16 幅附圖，難以適應學術界的需要。

1934 年 2 月，顧頡剛和譚其驤發起成立禹貢學會，在《禹貢》雜誌的〈發刊詞〉中就提出：「我們第二件工作是要把我們研究的結果，用最新式的繪製法，繪成若干種詳備精確而又合用的地理沿革圖。」但至 1937 年 7 月日本侵占北平，禹貢學會被迫停止活動，連沿革底圖也未能全部編成。抗戰期間譚其驤在遵義浙江大學史地系任教時，也曾著手編繪中國地理沿革地圖，但限於戰時艱苦條件，僅畫成二三十幅草圖。

### 三

要編繪一部符合歷史地理學要求、內容詳確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僅僅依靠沿革地理成果和傳統技術顯然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有歷史地理各分支學科特別是疆域、政區、地名、水系、海陸變遷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現代技術精確測繪成的今地圖，更需要大批專業人員長期通力合作。這些條件在 20 世紀 50—60 年代逐步具備，1954 年冬毛澤東批准吳晗重編改繪《楊圖》的建議使這一願望得以付諸實施。范文瀾、吳晗、尹達曾先後領導這項工作，由譚其驤主編，復旦大學、中央民族學院、南京大學、雲南大學以及中國科學院的歷史、考古、民族和近代史研究所等單位百餘人參加了編繪。幾經周折，終於在 1973 年基本完成，1974 年起用中華地圖學社的名義陸續出版了內部試行本。1980 年起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持對內部本進行修訂，從 1982 年至 1988 年出全八冊，公開發行。

這部上起原始社會，下迄清末，包括 20 個圖組、305 幅地圖和約 70,000 個地名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以下簡稱《圖集》），除了內容豐富，收羅宏博的特點外，還在科學性、思想性和精確性方面大大超過了其他同類地圖集，主要表現在：

1、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中國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但由於封建正統觀念和大漢族主義的影響，也由於少數民族的歷史大多未得到足夠的記載和研究，以往的歷史地圖一向只畫中原王朝，實際上抹煞了非漢民族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圖集》以如實反映各民族共同締造偉大祖國的歷史為目的，確定以 19 世紀 40 年代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以前的清朝版圖為歷史上的中國的基本範圍。歷史上所有在這一範圍內活動的民族所建立的政權，包括雖有部分轄境在此範圍之外但其政治中心在此範圍內的政權，無論是漢族或其他族，都毫無例外繪入圖中。一些邊疆地區、少數民族政權如吐蕃、突厥等，還儘量選用了顯示他們極盛疆域的年代。《圖集》既反對那種只承認漢族政權、中央王

朝為中國的謬論，也否定了把少數民族政權、邊疆地區政權都作為漢族政權和中央王朝附庸的觀點，有利於人們了解歷史事實，增強民族平等的觀念，正確理解中國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過程。

2、以前的歷史地圖集只能以文獻資料為定點上圖的依據，而且由於歷史記載極為浩繁，編者精力有限，錯漏難免。在歷史文獻本身記載錯誤的情況下，地圖上的差異更難避免。《圖集》充分利用歷史地理學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並盡可能吸收了國內外已經發表的地理、考古、民族等相關學科的成果的資料，用於核實、校正文獻記載，填補文獻的空白。如對邊疆地區圖幅的編繪，由於廣泛收集了少數民族的文獻資料，參考了國外的論著，所以內容更加豐富準確。又如對河流、湖泊、海岸線等歷史上變化較大的自然要素，進行了一系列專題研究，因而改變了傳統的錯誤說法，對雲夢澤、洞庭湖、鄱陽湖、黃河、長江、海河、遼河等的變遷過程都採用了新的結論。對大多數只能依靠文獻資料確定的點和線，也組織人員進行了認真的分析研究，糾正了很多前人的錯誤。

3、歷史上疆域、政區、地名的變化很大，大多在同一政權時期中也屢有變易，而各史〈地理志〉對斷限一般都不夠重視，往往混一前後不同年代的建置於一幅。《楊圖》等大多根據〈地理志〉或「補志」編繪成圖，因而在同一幅圖上顯示的往往不是同一年代的建置，前後相差數十年至百餘年。《圖集》則無論總圖還是分幅圖，都確定標準年代（個別無法確定標準年代的則盡可能確定一段較短的標準時期），盡可能顯示同一年代的政權疆域和政區建置。考慮到有的時期歷時較長，變化較大，採用了多幅總圖分別顯示不同年代的狀況。

4、我國傳世的地圖，一般都是以一個朝代為一幅全圖。由於受到圖幅和比例尺的限制，內容只能非常簡略，定位也必然很不精確。《楊圖》採用了將全圖分解為數十幅圖的辦法（仿康熙、乾隆實測全國地圖），這兩個問題得到解決。但由於各分幅圖採用同一比例尺，而各歷史時期各地區的開發程度和文獻記載的詳略極不均衡，因此中原地區往往地名密布，幾乎難以辨認，而邊區卻顯得過於空白。同時這種平均分割法往往使同一政區分見於前後好幾幅中，查閱極為不便。《圖集》採用了按各歷史時期的大行政區（或監察區、地理區域）分幅，各幅又按其內容的密度採用不同的比例尺，必要時插入比例尺特大的局部圖，徹底解決了這個問題。

由於《圖集》內部本的定稿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間，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錯誤路線的干擾破壞和錯誤思潮的影響。儘管在修訂中已盡可能作了補充和修改，但限於時間和人力，當時被無理刪去的一些內容還無法全部恢復，有些已經發現的錯誤也因重新製版工



作量太大而暫時維持原狀。另外，大多數地名是根據文獻資料考訂定位的，與實際位置不符的肯定不在少數；古代的水道經流等難以正確復原；這些都有待今後改進，有的只能隨著整個學科的發展才能逐漸得到補充和修正。

作為一項大型的、長期的科研專案，《圖集》的出版只是發表了它的最後成果。但對於專門研究人員來說，《圖集》編繪過程中所收集的原始資料，編者的鑒別與考訂過程和結論的文字紀錄是同樣重要的。因為只有看到這些資料，才能判斷《圖集》的每個具體地名、點、線是否可信，並且可能了解到無法在圖上同時表示但卻有一定道理的異說。對《圖集》數百萬字的釋文的整理由原承擔單位分別負責，以地區分卷出版。其中《中國歷史地圖集釋文彙編·東北卷》（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8年）問世最早，《雲南卷》其次，但負責主體部分的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經多年準備，最近已決定將這些內容納入在新世紀啟動的「中國歷史地理資訊系統」（詳見下述）的資料庫中。由譚其驤主編的《簡明中國歷史地圖集》雖然基本上是《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地圖出版社，1991年）中總圖的彙編，但增加了由譚其驤親自撰寫的圖說，對中國歷史疆域政區的變遷作了高度概括的論述，多少彌補了釋文暫時不能出版的空缺。

嚴格說來，《圖集》應稱為中國歷史疆域政區圖，或者是中國歷史普通地圖集，因為它的內容只包括歷史時期各個政權的疆域政區、重要地名和有地名意義的建築，具有政區性質的民族分布，以及作為地圖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山脈；而沒有表達其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如地貌、水文、氣候、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面的內容。而作為名副其實的歷史地圖集，這些方面當然是必不可少的。政府部門、社會各界和學術界需要這樣一種地圖集，根據我們的歷史資料和已有研究水平也完全有可能編繪出這一圖集，所以從1982年起，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主持下，由譚其驤主編，復旦大學，北京大學，陝西師大，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歷史、考古、近代史、民族等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杭州大學等數十個單位的學者開始編繪這部包括20個圖組、千餘幅地圖的三巨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編稿已基本完成，正在製印中，第一冊將於近期出版。

由於各個專題和各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已經取得顯著成果，也由於歷史地圖集有巨大的社會需求，各種專題歷史地圖和地區性歷史地圖的編繪出版方興未艾，多達數十種。不少省市及地區的地圖集以歷史地圖作序圖，新編地方志中往往也繪有當地的歷史地圖。

#### 四

先師譚其驤先生在晚年曾與我談及《中國歷史地圖集》的不足，其一是它的內容基本限於疆域政區，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的編制這一不足已經得到彌補。但另一方面的不足卻很難得到改進，即《圖集》嚴格的標準年代與表示重大歷史變化的矛盾。據此我曾寫入一篇書評：

歷史上疆域的盈縮、政區的變革、治所的遷移、地名的改易是隨時在發生的。每一圖組少則數十年，多則二三百年，只有一個年代的分幅圖。因而如果不是在那一年發生的變化或存在的單位、地名，就不可能在圖上找到，必然令不少讀者失望。疆域政區上一些重大事件，由於發生在標準年代之外，就不大可能反映在圖上，特別是發生在上一個標準年代之後而又消失在下一個標準年代之前的變化，在圖上就會毫無蹤影可尋。例如明永樂五年（1407）在今越南置交趾布政使司，下轄 17 府、47 州、157 縣，至宣德二年（1427）撤銷。但由於此事介於上一個標準年代（元至順元年，1331）與下一個標準年代（明宣德八年，1433）之間，所以不可能見於《圖集》。

一個更大的矛盾是，由於史料方面的原因，《圖集》一般只能選與正史《地理志》或補志所取的年份作為標準年代。但從歷史或歷史地理研究的角度來看，這些年份就不一定有代表性，更難反映出該時期政治、經濟、文化、軍事、自然等方面的重大事件所造成的影響。而且《地理志》所載往往是一個朝代的極盛疆域，選擇這些年代編成的疆域政區圖必然會給多數讀者造成一個中原王朝的疆域始終強盛廣大的錯覺，不了解歷史上同樣存在過的另一面。以東漢政權為例，《圖集》為與《續漢書·郡國志》的斷限一致，以永和五年（140）為標準年代，從總圖上看，東漢的疆域與西漢元始二年（西元 2 年）相似。但實際上，在當年西北就發生戰亂，西河、上郡、朔方三郡治所內遷；次年，安定、北地二郡又內遷，東漢設在西域的長史府也時斷時續，遠不如初期那樣穩固；而東漢初年的實際控制區也比永和五年小得多；所以東漢大部分年代的疆域比圖上小不少。再以唐朝為例，儘管總圖已增加至三幅（總章二年，669；開元二十九年，741；元和十五年，820），大致顯示了唐朝的疆域由盛至衰的變化，但分幅圖基本是以唐朝極盛的開元二十九年為標準年代的，因而經歷了安史之亂以後這 150 餘年的疆域收縮和政區變革就得不到反映。<sup>13</sup>

<sup>13</sup> 葛劍雄，〈中國歷史疆域的再現〉，收入《往事和近事》，三聯書店，1996 年。

由於印刷地圖既不可能將不同年代的諸多內容繪在同一幅圖上，又不能將歷史時期地理要素的全部變化都用分幅地圖表示出來，這種以靜態地圖來表示歷史地理動態的矛盾是無法得到解決的。

歷史地圖的使用者會有各種目的，但都需要找到特定的年代和特定的地區，而且希望能對原圖上的內容有所取捨，刪去不必要的點線，增加自己的內容，以凸出主題。他們需要的是各種不同年代、不同地區、不同比例尺的歷史底圖，進而能將地圖上的有關要素量化，計算出具體的資料。現有的印刷地圖顯然遠遠滿足不了這樣的要求。

另一個難題是文字考證與地圖的結合。即使是一般讀者，也希望知道歷史地圖製作的根據，例如為什麼某地要定在這裏，某條線要畫在那裏，某一地區要有那麼大，某一條河要這樣流？都需要了解具體的史料根據；更不用說專業研究人員。當然，可以在地圖後面附上解釋文字，或在地圖集以外出版文字考釋的專著，但都難避免查找不便，無法與地圖上的點線對應的缺點。而且，考釋文字的詳略也不易掌握，簡略敘述雖能節約篇幅，但滿足不了專家學者的需要；詳盡說明則往往數量太大，使用的人卻相當有限。

隨著研究的深入和新的歷史信息的發現，歷史地圖必定有一個不斷修改補充的過程，但傳統印刷地圖的修訂和製印卻相當麻煩，往往要耗費很多很長時間，所以出版的地圖總是落後於研究成果和最新資訊。

當地理信息系統（GIS,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和數位化地圖（digital map）問世以後，這些難題都迎刃而解了。正因為如此，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決定不再簡單修訂《中國歷史地圖集》和整理出版考釋文字，而是採用最先進的技術，編製「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CHGIS, 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

這一系統的基本思路是：

制定一套完整、系統、全面、精確的編碼系統，將所有能夠發現並確定（包括能夠部分確定）的歷史地名全部編碼，做到一地一碼，即一個地名在空間和時間上的任何變化都將在基本碼不變的條件下生成新的代碼。

研製相應的數據庫，要求容量充分，信息完整，檢索便利，鏈接迅速，適應各種不同層次和深度的要求，將全部原始信息（包括史料、檔案、數據、圖像等）全部輸入，並能不斷更新。

以國家測繪局發布的數位化地圖 ArcChina（一百萬分之一全國地圖）為底圖，逐漸上溯，明代以後編出包括縣及縣以上界線、縣以下可考地名的逐年地圖，此前編出

包括縣以上界線的可考地名、間隔盡可能短的階段性地圖。

在完成普通歷史地圖後，進一步將歷史人文、社會、自然地理各分支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充實這一系統，使之日益完美，成為名副其實的歷史地理信息系統。

這個系統將提供一套開放的地圖和資料平臺，供歷史地理學、歷史學和其他任何學科和各類用戶使用，或作為進一步開發的基礎；其他全部產品將分批在互聯網上發布，供全世界非商業目的的用戶免費下載。

歷史地理信息系統的研製並不僅僅是編製歷史地圖，但歷史地圖是這一系統的基礎。離開了相應年代的地圖，各種信息的時間和空間座標就無法確定。正因為如此，迄今為止，我們的主要工作還是集中在地圖的編製，而將具體資訊的附加留給其他學者來做。我們計畫在今年內基本完成除新疆、西藏、青海、內蒙古和今國境外的歷史中國部分外的大陸各省區。

為適應傳統讀者的需要，我們還準備出版一套分省歷史地圖集。目前福建省分冊已經完成編繪，將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浙江分冊的資料，包括明、清時期的縣界變化，均已齊備。其他各省區將陸續編繪出版。

歷史地理信息系統的研製中最大的困難，還是基本史料的不足。系統對每一項資料都有時間和空間兩方面的要求，前者要精確至年，後者要有具體的點、線或面。但在多數情況下，史料中找不到同時具備兩方面條件的資料或數據。為此，我們確定了數據標準化的原則，即將時間概念模糊、難以量化的文字，按規定的原則處理為一個具體年代或起始明確的年代。在一個地名的置廢年代不明，即起始不明的情況下，採用自動延續的原則，即在沒有明確記載曾經廢止的條件，上一次記錄與下一次記錄之間視為延續。同樣，在有明確的廢止年代記錄的情況下，距同一地名下一次記錄出現前的年代均視為廢止。由於系統的開放性和易於即時增刪的便利，一旦發現新的史料隨時據以增補、刪除或修改。

至於連採用這些辦法也無法填補的空白，那就只能付諸闕如，保持空白。因此即使在系統的全部研製完成後，數據的起始年代也會不一致，即使在資料相對完整的年代，也難免不出現若干空白。如果說一個面的確定還能借助於技術手段的話，我們不可能在沒有任何原始資料的情況下確定一個點的位置。我們自然夢想有朝一日會有新的文獻出土面世，甚至發現第二個敦煌藏經洞，但更寄希望於相關科學技術的進步。但是既然歷史地理信息系統是建立在歷史信息的基礎之上，那麼其中的某些空白將是永遠無法得到填補的。